

日本近代史研究





01464751



ISBN 978-986-6913-30-3



00370



9 789866 913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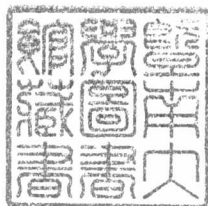
K313.407
2011

港台书

日

本

近代史



研

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日本近代史研究 / 李永熾著 -- 初版.--臺

北縣板橋市：稻鄉,民 97.05

面：21 公分

ISBN 978-986-6913-30-3 (平裝)

1.現代史 2.文集 3.日本

731.2707

97007236

日本近代史研究

作 者：李永熾

出 版：稻鄉出版社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

電話：(02) 22566844、22514894

傳真：(02) 22564690

郵撥帳號：1204048-1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印 刷：紘億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新台幣 370 元

初 版：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ISBN：978-986-6913-30-3

※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本書所收論文除篇首二文皆撰成於一九七六到一九八〇年之間。篇首二文原收於《日本的近代化與知識份子》一書，因該書已不見於市面。乃將此二文略事修改後，收入本書。

一九七五年出版《日本近代思想論集》後，陸續寫了一些論文，分別在學報雜誌發表。因當時正在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而且反日情緒滿高，自己對這些論文也就不大在意，反正結集出書，必跟《日本近代思想論集》的命運一樣，無人問津，便束之高閣，不加理會。吳密察教授留日回國後，覺得這些論文還有一些價值，一再勸我結集出版。在他慫恿下，曾一度向台灣最以文化事業自豪的大報出版社提起，也如石沉大海。我知道這家以出留美學人作品聞名的出版社不會理睬，果然不如所料。去年，吳教授又提起出書的事，我對他說：「這些論文都是七〇年代後期的東西，也許時過境遷，不必再予理會了。」吳教授留日時曾撰文介紹台灣的日本近代史研究，細讀過我所有的論文，認為尚有參考的價值。沒想到他竟把這些論文交給了稻禾出版社，稻禾也不懼虧本，把校樣送了過來。

趁校對之便，仔細審閱這些久束高閣的論文，雖然有些頗不滿意，但也看出了一些我目前思想的影子。雖不滿意，也許還可以提供他人做參考吧。如果看過我的《日本式心靈》的人，想必會發現七〇年代的我和八〇年代的我竟然這麼不同。但是看過《徒然集》的人，也許會覺得七〇年代的我和八〇年代的我竟然這麼相似，沒有什麼進步。的確，我沒有什麼進步，在學術上如此，在思想上亦然。我常覺後生可畏；在大學裡，我雖然也指導研究生寫論文，卻時覺自己的學生已超過自己。爲此，我不能不時鞭策自己，依然進步有限。不過，話說回來，學生勝過老師，正意謂台灣的進步。台灣能進步豈不是值得心喜之事！

八〇年代，不僅台灣社會發生巨大變化，世界也同樣發生出人意料的变化。世事多變，也許是八〇年代的寫照。其實，八〇年代對日本的觀感也發生了莫大的變化。以前，由於種種因素，台灣是走排日路線，研究日本常會被人注以異樣眸光，所以是一條寂寞的路。而今，大家已經覺得研究、了解自己鄰居是理所當然的事了。思念過去，不禁感慨之至。

這些論文是否值得參考，實在可疑。既然吳教授認爲可以出版，稻禾出版社也願意冒險，就讓它們到社會上接受挑戰吧。因此，這篇序只敘述出版的心境，不談自己探研日本的歷程。然而，不論如何，吳密察教授和稻禾出版社的盛情，我都由衷感謝。

一九九二年二月五日夜

目錄

序	一
明治初期日本的近代化與知識份子（一八六八～一八九四）	一
前言	一
日本近代化的政治過程	二
文明開化期的知識份子與代表性思想	十
自由民權期的知識份子與代表性思想	二一
自我的探求與國權的外延	二九
結論	三四
加藤弘之的早期思想與日本的近代化（一八三六～一八八二）	四一
前言	四一

加藤弘之與日本當時的思想風土	四四
天賦人權政體觀的形成	五九
民選議院論爭時的加藤思想	七七
加藤的思想轉向	九〇
結論	一〇〇
明治日本「家族國家」觀的形成	一一三
近代日本的歷史學派經濟思想	
——以大島貞益的「情勢論」為中心	一六三
北村透谷的思想考察	一八九
前言	一八九
民權運動的結構	一九〇
內在自我的結構	一九八

傳統與近代——國民主義的創造	一一〇六
結論	一一一六
北一輝與日本國家社會主義	一一二七
北一輝的生涯	一一三〇
北一輝的社會國家理念	一一三七
北一輝的社會國家論的理論基礎	一一四八
北一輝的日本國家論	一一五八
結論	一一六九
吉野作造民本思想	一二八一
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理念的形成	一二二一
前言	一二二一
國防國家的理念	一二三三

東亞新序的形成	三三六
「大東亞共榮圈」理念的變遷	三六〇
結論	三七〇

附錄

——本書論文初刊之學報雜誌	三八一
再版序	三八三

明治初期日本的近代化與知識份子 (1868~1894)

前言

本文試圖從思想立場探討明治初期知識份子對日本近代化的反應及其離合度。這裡指稱的「知識份子」意謂：受過教育、具有獨立思考性、對既存權力採取批判態度的人，故以在野的知識份子為主。此處所謂的近代化和一般取義不盡相同，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經由外在強大壓力，從封建體制走向近代國家體制的政治過程。在此過程中，國家如何企圖擺脫外在壓力，集結國民動能 (energy)，走向統一體制，也為本文探討的一環。

探討的範圍設定在明治元年 (一八六八) 到明治二十七年中日甲午戰爭發生 (一八九四) 為止，這段期間是日本由封建國家到近代國家的成立期。

在方法上，則以日本近代化的政治過程為一恆定線，而以知識份子為主體，思想為內涵，測度知識份子的思想對此恆定線迎拒的關係，藉此表明日本明治初期思想的一般概況。基於這個原

則，本文擬就下列數點，探討知識份子與近代化的關聯

(1) 日本近代化的政治過程：主要在探討日本處身歐美列強壓迫之下，如何主體地整編國家體制。

(2) 文明開化期的知識份子與代表性思想：文明開化即日本積極攝取西方文化的時期，大約由明治元年到十年為止。本節意欲探求這時期中知識份子的特色，及其與政府的迎拒關係。再從這些知識份子中抽樣論述具有影響力的思想。

(3) 自由民權期的知識份子與代表性思想：這段時期部分與文明開化期重疊，部分為開化期的後延。論述重點與(2)同。

(4) 自我的探求與國權的外展：自由民權運動受挫折後，天皇制思想漸趨圓熟。在天皇制思想強大壓力之下，日本知識份子的「內迴」與「外現」究竟如何，是本節討論的主題。

日本近代化的政治過程

自一八五三年美艦渡日之後，列強勢力逐漸入侵，綿延兩百多年的德川封建政權，從此陷於內憂外患之中。基盤向來鞏固的封建體制，爲了對應國家新局勢，不得不重編改組：首先允許本無政治發言權的封建藩主參與政治行動；錄用下級武士主持外交財政業務；政治門路逐漸開放，組織諸侯聯合政權。但就在此開放過程中，封建頂點的幕府，已自覺本身政權的分化與危殆。於

是致力於絕對主義（開明專制）的改革，一面加強中央集權，一面利用與法國的關係，企圖重組幕府體制。但在列強強大武力的威脅上，日本民族自覺已在土族階層中展開，民族主義運動因而興起。

民族主義運動的主導者屬於藩士與草莽層，他們認為，在強大外壓下，要使日本免於淪為殖民地的命運，必須加強國防，由此衍生出「排外的攘夷論」。但攘夷論與當時幕府主張的「開國和親政策」正好相反，攘夷思想遂與反幕情緒結合，形成一股強大的攘夷反幕風潮。爲了和開國論的幕府對抗，攘夷論者的目光遂專注於神權天授的朝廷。在思想上，則由對「領主」的忠誠轉爲對「天皇」的忠誠①，「尊皇」與「國防」乃成爲攘夷論者反抗幕府的重要武器，逐漸形成以天皇爲主的民族主義運動，但自一八六〇年代初期開始，這種盲目的攘夷論、狹隘的民族主義運動，已擴大轉向爲國權的民族主義。

一八六〇年代初期，攘夷據點：薩摩、長州二藩歷經薩英戰爭，四國（英、美、法、荷）艦隊砲轟下關等事件，西方的船堅砲利，使剛握藩權的激烈攘夷論者、反幕論者，不得不醒悟盲目攘夷不足以振興日本，例如長州藩指導者之一——伊藤博文就認爲：「欲振興日本，惟有採取開國方針與萬國交通，除非在內先確定大政統一，則不能伸國威於外。」②高杉晉作也認爲：要振興日本，須放棄「小攘夷」（盲目排外），和外國往來，割據一地，以武力達成全國統一，然後才能實現「大攘夷」的目的③。他們的主張，總括而論就是：以國家統一爲前提，富國強兵爲手

段，才是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大攘夷）的重點所在。薩摩藩的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亦持同樣見解。有了這樣的認識與自覺，兩藩遂極力和英國親近，並把以前的「藩意識」擴轉為「全國意識」，「士族意識」擴轉為「人民意識」，積極把藩內人民的動能集流於國家意識中。他們認為要達成大攘夷的目標，幕府是最大障礙。於是，推翻幕府遂成爲今後努力的目標之一，以前的「尊王攘夷論」也轉換爲「開國討幕論」。長州、薩摩兩藩目標既然一致，一八六六年成立了「薩長同盟」，在日本國內形成足以和幕府對抗的民族主義集團。

一八六八年以薩長爲首的討幕派，推翻了企圖重建幕府體制的封建勢力，建立了以天皇爲主體的政權。明治初期的政權遂由薩長主導者掌握，因此政府也就朝向「大攘夷」的目標前進，同時，一方面推行政體近代化，另一方面使天皇神聖合理化。

在政體近代化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強化政府。建立明治政府的薩長討幕派官僚，藉天皇權威，首先將國政恢復爲古代天皇主政的形式，以實施中央集權政策。這種復古主義本身已含有否定封建割據、建立一統體制的意義在內，間接表現了明治政權的合理性。但當時傳統的封建勢力仍然相當雄厚，士族反政府的情緒也很高昂，在在影響政府「大攘夷」目標的推動，因此，解散士族集團，遂成明治政治的急務。明治二年（一八六九），在天皇神聖的號召下，要全國領主階級奉還版籍。「版籍奉還」是明治政府向領主、士族階級妥協的一項方案，也是向領主階級奪取土地、人民的第一步政策。更深一層說，政府欲藉此逐步解散封建階級，將全國土地、人民歸於

中央，實行中央集權。但因恐懼士族集團的抵抗，不敢斷然處置，暫時採取「可與則與之，可奪則奪之」④的妥協手段，仍以原藩主為藩知事，接受中央政府統治。就政權統一與政體近代化的觀點而論，「版籍奉還」對封建體制的破壞並不够徹底。

在版籍奉還過程中，薩長藩士爲了將明治政權合理化，不得不強調天皇的權威與神聖；這種宣傳乃成爲政府集結人心的手法之一，首先把天皇歸附於古代的神道，在中央官制中，特設「神祇官」，位於百官之上。接著積極展開遷都，行幸、禮服、天長節等一連串活動，企圖把「天皇意象」注入人民腦海。中央集權加上天皇神聖，遂構成天皇制絕對主義的政權。

就政府方面而言，版籍奉還或天皇神聖，都是消極的手法，但可說是日本積極走向中央集權過程中的一項「布石」。布石完畢，接著來臨的就是徹底解散封建體制的行動。明治四年（一八七一），準備工作已經成熟，以薩、長、土佐三藩的軍事力量爲後盾，斷然實施「廢藩置縣」，封建領主階級從此解體，延續了兩百多年的封建體制完全終結，日本統一國家的體制形成。

在廢藩置縣時，天皇上諭已說：「內安億兆，外與萬國相對峙」⑤，暗示日本統一國家形成後，未來的目標將放在富國強兵以與萬國對峙上。但欲與萬國對峙，內在條件必須能夠配合，當務之急莫過於集結全國人民的動能。在這以前，明治政府的成立，主要是依賴士族階級的支持，如今開始把視線轉放在廣大民衆身上。如何使人民結集動能，發揮潛力支持政府，遂成爲當前面臨的重要課題。這單靠宣傳是不夠的，必須有實際行動，但人民的企待和政府的期望往往無法完

全相符，容易產生矛盾。因此，在實施上，一方面以武力為後盾，一方面考慮人民的需求，加以調和妥協，就成為明治四年以後日本政府實施改革的重大特色之一。

當時各項改革均以「西歐式資本主義文化」為目標，中央官僚眼中的西歐資本主義文化，大致說來即「自由平等」四字。所謂「自由」，即解除封建束縛；所謂「平等」即對國家奉獻的平等。基於這項條件的制約，明治政府開始積極推行各項改革：在「自由」這一點上，明治四年（一八七一），廢除封建時代的賤民稱謂，允許田地自由耕種，廢除宗門人別帳，聽許人民散髮；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允許人民買賣土地，禁止買賣人身，頒布學制，職業遷居自由，廢除士族的軍事特權，人民有服兵役的義務；明治六年（一八七三），頒布地租修正令，統一地租。在平等這一點上，則宣稱「四民平等」，廢除封建時代的身分制，一切婚姻、職業、遷居、生活方式等隨身分制而來的差異，全部廢除。

這些改革，雖然獲得相當的成就，但也內涵有許多矛盾，例如地租修正令，明治政府的目的，並非在減低人民的稅收，而是在「維持政府的歲收」，利益偏向於地主階級，與人民所企待的地租修正完全相反，因此，在明治六、八兩年，由於反對地租修正，發生了範圍頗廣的農民暴動，政府不得已，在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宣佈減租。此外，在徵兵與學制方面，政府遭遇的處境也大同小異。

對於集結民力，政府採取控制與滲透的方法，一方面整頓、重建警察制度，另一方面建

立「家長制」，賦予家長極大的權力與特權，代表「天皇」意志，使之成爲天皇制的基層負責人。

除了這些國內的整頓外；明治政府最急切而重要的任務，就是幕末時期討幕派倡言的「大攘夷」——「富國強兵」。富國強兵的先決條件是：開發國內動力資源——殖產興業。但當時日本的產業資本尚未開展，無法獨立發展歐洲式的近代產業，只有盡力移植歐美的生產模式與技術措施，同時積極培養民間企業。等到近代歐美資本主義的「資本」移入後，日本政府開始著手興辦軍事、纖維業的官營模範工廠，敷設鐵路，架設電訊，移入農業新技術，扶植海運業，經營礦山等，逐步走向工業化。在殖產興業達到相當程度後，政府的方針逐漸移向對外爭取平等，欲與歐美列強在東亞爭一日之短長。

綜上所述，自明治元年至十年，日本政府施政的重點，不外是中央集權——政體近代化、社會改革——社會自由平等化、富國強兵——工業化與國權化。這就是日本史學家統稱的「文明開化」時期。文明開化的主要目的是達到歐美資本主義式的文明。但歐美資本主義曾經二、三世紀的孕育才告完成，而其動力，據大塚久雄教授的研究，是由下而生的內在衝力^⑥，出於人民自動，是人民向絕對主義政權爭取民主的成果。而在日本卻完全不同，其發展是被動的，是受列強壓迫而生的民族主義式的反抗。主體不在人民，而在權力機構，日本的近代化是由上強迫推動的。歐、日近代化由於主體的不同，引致的結果自然有所差異，因此，歐美形成資本主義式的民